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II 1938: 雷马屏峨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经费专项资助出版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II 1938: 雷马屏峨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嘉文 张 磊
装帧设计：张 磊
责任校对：高余朵
责任印制：汪立峰

本著作系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成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II, 1938 : 雷马屏峨 / 孙明经摄 ; 孙健三著. — 杭州 :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8.6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ISBN 978-7-5514-2256-7

I. ①孙… II. ①孙… ②孙… III. ①新闻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J4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53984号

中国百年影像档案
ZHONGGUO BAINIAN YINGXIANG DANG'AN

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III SUN MINGJING JISHISHEYING YANJIU III

1938：雷马屏峨

1938: LEI MA PING E

孙明经 摄
孙健三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电话：0571-85159646

网址：www.photo.zjcb.com

制版：杭州真凯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刷：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89mm×1194mm 1/16

印张：12.75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2256-7

定价：108.00元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前 言

很久以前，现在四川南部的雷波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屏山县、峨边彝族自治县四县地界内外的深山老林中，就聚居生活着以骁勇著称的彝族同胞。我们今天称为彝族的民族，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曾被称为“东夷”，后称“西南夷”，再后来又叫作“夷族”，1956年定名为彝族。故本书中凡涉1956年之前的史料，均称“夷族”，其族人称“夷人”，此非现代汉语语境中“夷人”之语义，其他相关用语，以此类推。

在本丛书的《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1938：从重庆到自贡》和《孙明经纪实摄影研究 II——1938：从峨眉到乐山》两册中，已经分别对孙明经先生考察都江堰水系和峨眉山水系的纪实摄影做了简单的介绍。在本册中，大家可以在孙明经先生实地考察八十年后的2018年，通过他当年拍摄的部分残存的纪实摄影成果——当时被称为“雷马屏峨”的四个“夷族”同胞聚居县的照片，管窥一些当年的实际状况。

1938年，孙明经由他的恩师陈裕光、郭有守、魏学仁、柯象峰、徐益棠等学界泰斗的推动与引领，于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二十天时间里，进入当时四川南部的雷波县、马边县、屏山县、峨边县*。这四个地方在当时被学界称为陪都重庆的“椅子靠背”，也是被称为“雷马屏峨”的“夷族”同胞聚居地区。本书主要展示当年孙明经在科考过程中拍摄的、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残存的部分纪实摄影照片。

今天来谈1938年四川“夷族”聚居区的情形，就不能不讲几句关于“民族”和“夷族”的话题。

孙明经老师曾告诉笔者，他会在1938年携带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进入那片当时国内学界了解不多、被很多人认为“很神秘”的地区去科考拍摄，大背景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求存”的急迫需要，而小背景则是恩师们关于中国民族学创建与发展

* 注：峨边县，当时名为“戛边县”，本书中凡涉史料的“峨”字，当时均写为“戛”字，请读者自辨。

进程中的学术需求以及纪实摄影学科创建、教材建设过程中的学术需求。

1938年，日本鬼子不仅早已强占了我国的东北全境、长城以外的热河、察哈尔，还进军绥远，兵至五原，太原、武汉一线以东的大片富庶国土均被日军强占。面对强敌要把亡国灭种的灾难强加在我们的头上，中国人要想“决不亡国”“决不灭种”，一场残酷持久的全民族抗战无法避免！

持久的抗战，拼的不仅是军事实力，还有物资和资源。作为大后方的四川，不仅要保障前方正在和日本鬼子死战的几百万大军的军粮与兵源，还必须保障数以千万计的逃离敌占区而涌入的难民有饭吃。

持久的抗战除了要有足够的粮食，更需要整个大后方社会民心的足够安定。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多少国家民族的安危兴衰都与社会民心相关。我国的四川省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域，不但民族众多，而且各民族内支系庞杂，各民族各支系的历史、宗教信仰、习俗更是多种多样。因此，如何处理好四川的民族问题，自古就是考验历朝历代掌权者智慧的事情。

1937年7月7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国军队虽有可歌可泣的抗战，最终却面临接连失利、大片国土沦丧的不利情况，以致当时的首都南京告急，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放弃南京的决定。



图1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1937年11月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登“永丰舰”启碇西去，从而拉开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经营陪都的序幕。11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在会上做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演讲，发布“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的决定。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发表《国

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省及重庆地方政府与重庆父老民众的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开始在重庆办公。

自此，重庆担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职责，至1946年5月4日止。

四川有两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定蜀先定”。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只要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四川就必比天下先生乱。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四川必定率先太平安稳。当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处于被强敌撕咬、被施以“亡国灭种”之策的生死存亡之际，彝族同胞聚居的“雷马屏峨”，不仅成为陪都重庆地理学意义上的“椅子靠背”，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椅子靠背”。事实上，我国学界对“雷马屏峨”的关注早就开始了。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的有识之士及世界的学界精英，已预见到“这仅仅是开始”，“中日必有一场大战，乃至有可能发展成为决定各自国家命运的全面大战！”有学者甚至提出：“一旦大战开启，日军强大的海军舰队和陆战队，随时可以沿长江长驱西进，直捣首都南京。为应变，政府应提前预备临时行都的设置。”于是，有学者提出“洛阳行都”的预案，竟然一语成谶——1932年1月31日至11月29日，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军事威胁下移驻洛阳办公。之后，国民政府又还都南京。此时，“谁能保障日暴（日军）不再重启淞沪之战？”“谁能保障日暴兵舰不再兵临南京城下？”的呼声不断。“一旦大战再启，日军强大的海军舰队随时可以再沿长江长驱西进，直捣首都南京！”的声音出现了。此声一出，学界对于即将必然到来的中日大战“我国必须预做准备”的讨论此起彼伏。一时间，关于“战，中国必胜论”“战，中国必速胜论”“战，中国必败论”“战时首都陪都的设置”“抗战大后方的问题”以及关于“持久战”之议蜂起。继而，有关“西安陪都论”“洛阳陪都论”“成都陪都论”“重庆陪都论”“山陕大后方论”“滇黔川大后方论”等纷纷登场。

面对这场我国学界的大讨论、大争论，一批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人，开始了实实在在的研究工作——从我国的历史、地理、人文考察中寻求答案，外国学界的诸多精英也参与其中。在这场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学界大讨论中，“民族学”这

三个汉字组成的词汇，不仅悄然出现，更是引发学界翘楚的关注，成为一个学界热词，并从此敞开了——中国“民族学”的大门。

我们中华民族虽是一个拥有古老历史与文明的民族，但今天所说的和所理解的“民族”一词，相对于我们民族的历史长度而言，实在是一个太年轻的词汇。当代学者普遍认为，今天民族学中所说的“民族”一词是一个外来词汇，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通过对欧洲世界史著作的评介，破天荒地使用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

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20世纪初，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出现。

1923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曾担任过我国没有皇帝以后第一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出席了在荷兰、瑞典等地召开的国际民族学会议，又到汉堡大学做了民族学方面的专门研究。正是由于这一经历，他撰写、发表了若干有关民族学的论文，并成为我国民族学创建早期的重要成员。

1926年，蔡元培在一本在中国杂志历史上很不一般却偏偏名叫《一般》的杂志的一卷第十二号上，发表了《说民族学》一文，第一次在我国提出“民族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对民族学做出了定义。《说民族学》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蔡元培其后关于民族学的推动、宣传，乃至他本人关于民族学的种种活动宣传及亲自操作，为民族学在我国能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28年，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随即开创了由他自己任组长的民族学组。

1932年3月1日，在日本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建国”，扶持溥仪为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这一事件发生后，我国学界中对“中国民族学”的研究迅速升温。

而“中国民族学”研究成规模兴起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

1934年夏，徐益棠、凌纯声、邱长康、孙本文、何联奎、胡鉴民、卫惠林、黄文山等学人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发起召开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六个月后，中国民族学会正式成立。中国民族学会筹备会在为该会拟定的简章草案中提出，中国民族学会的宗旨是“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并拟定了学会成立后的五项任务：

- 搜集民族文化的实物；
- 调查中国民族及其文化；
- 研究中国民族及其文化；
- 讨论中国各民族及其文化问题；
- 编辑刊物与丛书。

1934年12月16日，我国学界翘楚——民族学者、社会学者及人类学者蔡元培、凌纯声、刘咸、徐益棠，解剖学专家欧阳翥，神经学专家庐于道等人发起，在南京中央大学中山院举行中国民族学会成立大会。

在上述的时间段内，我国从南至北，或前或后还有一批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如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费孝通等人，在多所大学中或先或后开设了与民族学相关的课程。

在我国，民族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发展进程中，徐益棠先生是一位很重要、很关键的学者。让笔者这个晚辈以崇敬的心情对孙明经的恩师徐益棠先生、柯象峰先生和刘国钧先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徐益棠（1896—1953），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崇福镇）人，南京大学前身金陵大学著名教授，我国现当代最早发起边疆研究的著名学者和中国民族学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当代具有重要影响的民族学家。

1925年，徐益棠先生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1928年，入法国巴黎大学民族学院研究院深造，师从有“20世纪法国民族学之父”之称的马塞尔·莫斯。1933年，获博士学位，应金陵大学教务长柯象峰、文学院院长刘国钧之邀回国，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

回国后，徐益棠先生除担任金陵大学教授、金陵大学社会学系边疆社会研究组主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外，还历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全国风俗

普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学会书记，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边疆学会、中国边政学会理事，《边疆研究论丛》主编，《西南边疆》（月刊）社长兼主编，边区施教团副团长等。

徐益棠先生在我国边疆民族史的研究方面，不仅承继了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研究，更从国外引进了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概念与方法。他长期关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主张田野工作“事实第一，理论第二”，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关注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并尝试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之中，因此在写作时，徐益棠先生更加注重体验式的描写及对日常生活的细微观察。

仅举一例，便可见徐益棠先生对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性与地位。1941年秋，中国民族学会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由徐益棠任书记。由于当时条件过于艰难，学会一时没有办公地点，中国民族学会通信处只能设在了他的家中。当时，他在成都的寓所门口挂了两块招牌，一块是“中国民族学会”，另一块是“西南边疆杂志社”。

徐益棠先生在民族学领域中涉猎广泛，学术视野宽阔，而且颇有深度。他的民族学研究的主要成就虽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方面，但并不局限于此，还编著过《台湾高山族开发史料辑要》，并发表了《台湾番族研究资料》《台湾高山族之文化》《外蒙古地理简说》《西北建设纲领及其方案》《民族学上的新疆民族问题》《新疆问题之地理观察》《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之必要》《边疆教育的几个原则》等论文，总计近七十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益棠先生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兼历史系教授等职。

柯象峰（1900—1983），安徽贵池县（今池州市）人。十二岁入南京金陵中学，毕业后入金陵大学，主攻经济学。1923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

1927年至1930年，柯象峰先生留学法国里昂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任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员。1931年，应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邀请，回母校创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社会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校教务长。

柯象峰先生毕生从事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我国开创并讲授过劳动保险、劳动政策与立法、人口统计、人口地理、生命统计、社会调查研究等课程。他提倡并致力于社会调查研究，认为要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贫困化问题，应注重改进文化环境，发展科学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柯象峰先生著有《现代人口问题》《中国贫穷问题》《贫穷问题》《社会救济》《保民婚俗》等专著，主要译作有《欧文选集》《黑格尔选集》等。柯象峰先生强调，民族问题是我国“社会问题”与“人口问题”的重要内容，并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率队深入西南康、藏、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开展实地调研。

在柯象峰先生生活的时代，他的学术成就具有相当大的国内和国际影响。柯象峰先生一生学术建树颇多，桃李满天下，对于年轻的孙明经以电影和照片开展科学调查工作给予过多方面实际的鼓励与支持。

刘国钧，1899年11月15日出生于江苏江宁府（今南京市），字衡如。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后留校图书馆工作。

刘国钧先生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其间加修图书馆学课程。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29年至1930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主编《图书馆学季刊》。1930年，在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的力邀下，回到金陵大学，先后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南京沦陷前随金陵大学西迁成都。1943年，到兰州任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1944年担任图书馆馆长，1949年担任顾问。1951年，刘国钧先生来到北京，先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系主任，并兼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图书馆顾问等。1958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1979年，刘国钧先生被推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1980年，刘国钧先生病逝于北京。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要旨》《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简编》《刘国钧图书馆学论文选集》等。

今天，因为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学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一般学术界对他一生学术贡献的认知，多偏于他长期从事的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学教学科研方面的成就，以及他在图书馆学研究上所倡导和亲为的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还有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新趋势。对他学术贡献的研究，也多侧重于对我国图书分

类、图书编目、图书馆自动化技术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方面。而对于刘国钧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为我国民族学创建初期发展所做的关键贡献，则关注不多。

1937年7月7日的那个夜晚，古都郊外卢沟桥头的枪声炮声，震醒了我们这个被压迫、被欺侮了近百年的伟大而古老的民族！中华民族从麻木、昏睡中被震起，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用不同的方言喊出了同一个强音：“抗日救亡！”“抗战图存！”一场规模空前、壮烈空前的全民族争生存的伟大抗战就此开始。

北平一带的抗战，仅仅是这场为民族存亡而战的大战争的序幕，真正把全面抗战大幕完全拉开的地方在上海，在这座当时整个中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在这座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城市！

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中日双方共投入一百多万的军队。其中，中方一百四十八个师加六十二个旅，共八十余万官兵，统计死伤三十万人；日军投入八个师团加两个旅团共二十余万官兵，宣布死伤四万余人。这场战役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标志着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的地区性冲突已演变升级为中日两国全面的生死大战。

尽管淞沪会战彻底粉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喧嚣，尽管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我军民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但很快，日军还是大规模堂而皇之地占领了当时的首都南京。

中国不得不在1932年的五年之后，再一次被迫“迁都”。这一次，选择的不是洛阳，不是西安，而是重庆。不仅重庆从此要担起战时首都的责任，连地处深山中的“雷马屏峨”也必须就此从地理到人文一起成为陪都的“椅子靠背”。“雷马屏峨”还要担起战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所在地的职责。

正因为如此，认真了解“雷马屏峨”，成为当时我国地理民族学泰斗们必须勇于承担的使命与责任。

到此，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再谈谈刘国钧、徐益棠、柯象峰三位先生。

20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边疆频频发生变故，直至伪满洲国的出现，深深地刺

痛了国人的心，不能不引起我国一批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学界翘楚“还未痛定之必须更加思痛”，也不能不引起我国一批具有爱国心的政府要员以及教育部要员的关注，同时，也唤起了国内学界对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全新思考。徐益棠先生认为：“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

1934年秋，时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刘国钧先生有感于我国边疆民族问题已发展至极为严重的程度，拟在金陵大学开设边疆史地讲座以推动边疆研究的发展。他请徐益棠先生拟出详细的讲座计划，并向教育部提出申请。在当时我国边疆民族事务的专门研究机构极少、人才极度匮乏的环境下，教育部专员郭有守博士对金陵大学申请设立边疆史地讲座一事极为支持，促成教育部为此专门授予徐益棠先生“教育部边疆问题专任讲座衔”。从此，徐益棠先生对边疆民族史研究的成果得以广传。他强调，对我国民族史学的研究，除承继《春秋》《左传》《史记》以来我国史学传统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描述与研究成果外，另一方面必须加入、引进国际上最新的史学、民族学、社会人类学与考古学的成果、概念和方法。徐益棠先生强调，不仅要关注北方民族，还必须长时期关注西南少数民族，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主张田野工作中“事实第一、理论第二”的原则，强调要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中的存在，关注历史发展中的族群生态，以此将其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之中。徐益棠先生强调在写作调查成果时，注重体验式的描写及对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观察，以使自己的考察成果，可以对实际政策的制定，提供资料性的说明乃至指导。

徐益棠先生开设的这一系列以民族学、边疆政治史、边区人文地理为内容的讲座，在全校范围内供学生选修，开了金陵大学边疆民族教育的先河。这种内在连续性很强、不间断的讲座模式逐渐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与兴趣，并成为边疆民族研究在金陵大学得以深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4年刚刚毕业留校的孙明经，被这些讲座丰富精彩的内容深深吸引，他听课时的认真态度、每次讨论时的积极参与也引起了徐益棠先生的注意，以至两人逐步有了更多的交往和学术方面的交流。徐益棠先生的系列讲座，还吸引了一批当时在南京工作生活的有影响的学界翘楚的关注，他们甚至亲自到场听讲并参加讨论。

1935年12月16日，中国民族学会在南京新街口国际饭店举行第一届年会，会议

由徐益棠主席主持，报告过去一年间的会务。会后，他被选为学会七理事之一。

在这一背景下，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博士对徐益棠先生的工作给予了支持，包括要求本校刚刚建立的电影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们对此加以关注。这激发了作为电影教育委员会摄制部主任孙明经拍摄有关中国民族学内容电影的想法。

1936年，徐益棠先生出任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俗司全国风俗普查委员会委员，拟定了详细的全国风俗普查计划，并亲自负责宗教、迷信、巫术、禁忌组的筹备与训练指导工作。

1937年，学会计划开展两项重要活动，其一是继续筹划成立时即拟议编辑的《民族学报》，其二是推展全国风俗普查计划。其中，普查计划调查表格的设计由凌纯声、卫惠林和徐益棠三人负责落实，徐益棠先生具体负责宗教、巫术、迷信、禁忌部分。不幸的是，当表格填写完毕，正当汇纂之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学会会员不得不各奔东西，开办学报一事只能暂停。

次年，何联奎、黄文山、胡焕庸到了重庆，凌纯声、方国瑜到了云南，徐益棠到了成都，他们之间以信函联络，决定私人筹资创办《西南边疆》月刊，千难万难之中分别在成都和昆明交互出版，此举一时成为学界美谈。同年，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迁至成都，成为民国时期最重要和最有声誉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之一。应聘于该所的学者最多时有十二三位，其中几位是当时蜚声学坛的名家。

金陵大学主校区西迁至四川成都以后，比起原来在南京时的校址，与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近了许多，研究的机会自然多了，训练的需求也多了。于是在开课教授之余，徐益棠先生努力创造条件，以便尽可能多地开展一些实际的调查与考察。当时，又正好赶上战事紧迫，国民政府必须竭力开发西部各省作为长期抗战的大后方，这也急需了解与把握边疆少数民族的情况，而边疆各省为了自身发展，也在主动资助学者们进行民族调研与考察。

1938年初始，徐益棠先生告知刚刚到达四川的孙明经，自己正在筹备组团，并申报在当年夏天对川南“雷马屏峨”这把已被称为陪都的“椅子靠背”的四个“夷族”聚居县进行较深入的考察。他动员并建议孙明经参加，用照片，最好也用电影对考察成果予以记录，希望孙明经能为此做些案头准备。不久，西康建省筹委会抢先一步，手握经费直接找到金陵大学，请求民族学家们立即进康，对第二年即要建

省的西康开展考察。于是，柯象峰先生和院长刘国钧先生决定即刻组织西康社会考察团，由徐益棠、柯象峰带两名学生马上进康。

此时的孙明经已经为由徐益棠先生主持的1938年夏天开始的“雷马屏峨”科考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并从省教育厅长、自己的恩师郭有守博士那里申请到了一笔专门的资助款项，用于购买照相胶卷、相纸、洗印用药、电影胶片以及路费、食宿费，并得到了省教育厅开具的官方路牒。等他1938年6月中旬完成峨眉山考察下山时，才得知徐益棠先生已组团将赴西康，并得知省教育厅已通知“雷马屏峨”四县教育局，为孙明经的考察提供方便和帮助。于是，孙明经决定另选助手，自1938年6月下旬开始，自己先行一步对“雷马屏峨”四县“夷族”聚居地区进行考察。

考察原计划二十五天内完成，因中途接到学校紧急通知：“教育部已正式决定，教育部电影教育委员会和金陵大学理学院于1938年10月，正式合办有学历的大学电影教育开始招生开课”，孙明经最迟至7月中旬必须赶回学校。于是，孙明经比原定时间提前五天，匆匆结束对“雷马屏峨”的摄影考察，赶回学校。

面对开创我国有学历的大学高等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巨大的工作量，孙明经一时无法顾及自己在“雷马屏峨”四县拍摄成果的整理工作。

1938年，在校址借驻于重庆求精中学内的金陵大学理学院重庆分部，孙明经开创我国有学历的大学高等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的工作刚上轨道。1939年，日本人对陪都重庆的大轰炸越发猛烈，炸弹都扔到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黄山官邸。此时，考虑向新建的西康省境内“西移陪都”之议忽起。1939年1月，西康省成立，“加强和深化对西康全面考察”之议又开。对于孙明经来讲，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初，多方面的工作一股脑儿地涌来，一方面忙于招生开课，一方面忙于对自流井、贡井地区拍摄成果的整理，他又突然接到院长魏学仁博士“1939年下半年对西康深入考察的经费已经落实，你要做好必要的准备与功课”的通知。孙明经对于“雷马屏峨”底片的处理，此时又一次变得实在无暇顾及，只能再次搁置。对西康境内三条“茶马贾道”的拍摄考察自1939年6月底开始，至12月底结束，历时一百六十余日，刚刚归来的孙明经于1940年初又忙于整理大量西康拍摄成果和课程开设，突然又接到魏学仁“赴美考察美国电影教育电影事业与传播学教育的洛克菲

勒奖学金已获批准，现你要做好准备随时出发赴美”的通知。

1940年，当徐益棠率团以边区施教团副团长名义开始对“雷马屏峨”开展大规模深入考察时，孙明经已经踏上艰难的赴美之路。孙明经在出发前，安排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自己的下属胡玉章代替自己，携柯达A型电影摄影机随徐益棠赴“雷马屏峨”拍摄。

当徐益棠先生完成考察，整理编撰出版《雷马屏峨纪略》一书时，孙明经正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忙于考察电影教育与事业，以及电视教育与事业。

在正式开始展开这本画册的照片内容之前，笔者必须向各位读者做以下交代：

民族学是一门架构宏大、学术内容极其丰富的学科，需要多学门学科基础专业知识的支撑。民族学的学术内涵几乎涉及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开列的全部的十三个学门的知识，包括：01-哲学，02-经济学，03-法学，04-教育学，05-文学，06-历史学，07-理学，08-工学，09-农学，10-医学，11-军事学，12-管理学，13-艺术学。

民族学在我国作为一门学问的起点，从蔡元培先生开始，实在是绝非偶然。

而勉为其难编纂本书的笔者，对于民族学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在大门外边站过、朝门缝里张望过一眼的门外汉。笔者编纂本书的唯一理由，仅仅是受孙明经老师嘱托，因为几十年来实在是没有有其他学者愿意来干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虽然笔者曾受过孙明经老师几十年的教导，可怜笔者生性实在愚钝，孙老师过



图2 徐益棠主笔的《雷马屏峨纪略》一书首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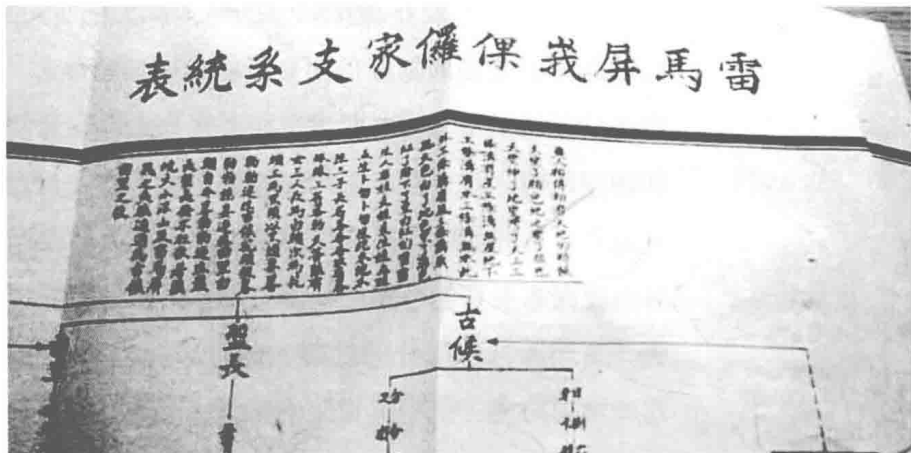


图3 徐益棠主笔的《雷马屏峨纪略》中的图表——雷马屏峨保家支系统表

世后，为编本书，笔者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的学问功课，对于“民族学”和“中国民族学”至今依旧懵懵懂懂。孙明经老师当年告诉笔者：他第一次在大学校园中听到专门讲述有关“夷族”内容的课程，是在徐益棠先生的课堂上。

在构成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夷族”（即今彝族）算得上最古老的成员之一。早在我国第一个朝代夏朝之前，还在我国历史中称为上古时期的早期——即甲骨文出现之前，还没有汉族文字记载的传说时期，就有强大的“东夷”或“东方九夷”的存在。我国东汉时期，学术界对于“东夷”的“夷”字的理解，就已经认识到它是“从弓”“从大”“从人”——随时随地身负强弓、身大智大地居住在太阳升起的东方的族群。



早在石器时代的末期，我们的祖先绝大多数还处于仅会使用木棍和抛掷石块的方法来猎取食物、驱赶猛兽的时代，居住在华夏大地东方的“夷人”，却已经是一个善于制造和使用弓箭的族群了。而且，“东夷”一个叫作“有穷氏”部族的首领“羿”，还当过夏王朝近四十年的“后”，从而在史中被称为“后羿”。也就是说，“夷人”中一个名字叫“羿”的青年部族首领，曾担任过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的一任国君！（夏朝最高统治者在位时称“后”，去世后称“帝”。）

孙明经老师告诉笔者，听到徐益棠先生讲述的那天，自己被震撼了。“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这八个汉字，还是在他自己启蒙的时候，在母亲把着手一笔一画最初学写汉字时就学会了的。然而，在堂堂中华的历史上，“夷族”居然有如此不得了的开始，实在是不能不感到震撼。

在金陵大学，为此感到震撼的，不仅有年轻的刚刚留校的孙明经，还有他的另一位重量级的恩师魏学仁博士。在当时的中国，魏博士称得上是坐头把交椅的光学泰斗，是当时我国唯一一位被国际学术界评价为A级大学的理学院的院长。1945年，联合国成立，他是在学术上唯一一位有资格代表中国、担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的理学大家，他也是我国电影、摄影、播音、电视等学科大学教育创建与初

期发展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学者和领导者。

在徐益棠先生有关“夷族”的讲座后不久，魏学仁请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一位汉语名字叫作“岭光电”的“夷族”土司，“夷”名牛牛慕理。这位真真切切的“夷族”青年土司于1933年以极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地处南京的“中央军校”第十期，人们习惯把这一期的军校生称为“黄埔十期”。

这位“黄埔十期”的青年学生，毕业后作为军人，后来在军中成为将军，官至副军长。而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成就却是自幼开始直至1989年去世，在“夷学”（彝族学）教育、研究与译作、著述方面的辉煌成就。

在徐益棠先生的课堂上，已经被古老“夷族”曾经的辉煌震撼了的孙明经，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地与一位仪态潇洒、彬彬有礼、谈吐谦恭的青年“夷族”土司交往。在他的心里，“夷族”给予自己的已经不仅仅是震撼了……

从这位真真实实的、年轻的、一身学者风范的“夷族”土司的嘴里，孙明经听到了一个让他一生都不敢真正彻底相信的内容：“夷族”拥有比甲骨文更古老得多的文字——“古夷文”。在“夷族”父子世系相传的谱牒中，至当时已经传承了脉络清晰的七百多代。要知道，在当时，孔子一脉仅仅相传了七十余代呀！

若一代以二十五年计，七百代即是一万七千五百年！若以二十年一代计，七百代也有一万四千年之多！当时学界公认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也不过五千年光景，而古老的甲骨文据当时的学界推测，最多也不过三千三百年至三千五百年的历史。

这一次与岭光电的会见，使得魏学仁和孙明经都萌发了“有一天一定要带着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到岭光电的家乡‘夷族’地区好好拍摄考察一番”的冲动。

孙明经老师告诉笔者，他第二次见到这位“夷族”土司已经是1938年的5月。那时，自己刚刚结束在自流井和贡井地区的拍摄，是返回成都的第二天。

据孙明经老师自述，他是1938年5月5日结束在



图4 “夷族”青年土司岭光电